



清末民国中学文学 教育研究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of middle school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张心科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清末民国中学文学 教育研究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of middle school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张心科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 / 张心科著.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04-048727-5

I. ①清… II. ①张…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研究—
中国—近现代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2628号

策划编辑 张 召
责任校对 刘娟娟

责任编辑 张 召
责任印制 尤 静

封面设计 李小璐

版式设计 李小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45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8727-0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目 录

绪言	1
----------	---

第一编 清末民初的中学文学教育（1902 ~ 1918）

第一章 清末中学文学课程	22
第一节 中学堂章程中的文学	22
第二节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文学	28
第二章 清末中学文学教学	42
第一节 中学经文学教学	42
第二节 中学古文学教学	44
第三节 中学纯文学教学	46
第三章 民初中学文学课程	48
第一节 民初中学国文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48
第二节 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	52
第四章 民初中学文学教学	70
第一节 官方规定的中学文学教学	70
第二节 民间实行的中学文学教学	71

第二编 新学制前后的中学文学教育（1919 ~ 1927）

第一章 国语科初设时期中学文学课程	78
第一节 中学文学课程改革的前奏	78
第二节 中学白话文教材中的文学	87
第三节 中学文言文学教材的改革设想	97
第二章 国语科初设时期的中学文学教学	100
第一节 中学文言文学教学的改革设想	100

第二节 中学白话文学的教学实验	104
第三章 新学制时期的中学文学课程	111
第一节 中学国语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111
第二节 中学国语、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	123
第四章 新学制时期的中学文学教学	149
第一节 班级授课制中的中学文学教学改革	150
第二节 道尔顿制中学文学教学实验	158
第五章 国语设科及新学制时期中学文学课程的论争	165
第一节 中学国语课程名称与文学作品语体的论争	166
第二节 中学国语课程目的与文学作品题材的论争	176
第三节 中学国语(文)教科书中选文功能与文学作品比重的争论	180
第四节 中学国语(文)教科书选文组织与文学作品编排的论争	185
第六章 国语设科及新学制时期中学文学教学的论争	193
第一节 班级授课制中学文学教学的论争	193
第二节 道尔顿制中学文学教学的论争	197

第三编 新标准时期的中学文学教育(1928 ~ 1936)

第一章 暂行课程标准颁行前后的中学文学课程	206
第一节 中学国文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206
第二节 中学国语、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	212
第二章 暂行课程标准颁行后的中学文学教学	234
第一节 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的文学教学	234
第二节 中学国文教科书、教学论中的文学教学	236
第三章 正式课程标准颁行时期的中学文学课程	243
第一节 中学国文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243
第二节 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中的文学	254
第四章 课程标准颁行时期中学文学教学	288
第一节 中学国文教科书、教学法中的文学教学	288
第二节 中学国文教学论中的文学教学	293

第四编 全面抗战和内战时期的中学文学教育(1937 ~ 1949)

第一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学文学课程	300
-------------------	-----

第一节 中学特种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302
第二节 中学国语、国文教材中的文学	303
第三节 中学国文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318
第二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学文学教学	326
第一节 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教学	326
第二节 中学国语、国文补充教材中的文学教学	329
第三节 中学国文教学法、教学论中的文学教学	333
第三章 内战时期的中学文学课程	339
第一节 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	339
第二节 围绕国定本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文学的论争	351
第三节 中学国文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358
第四章 内战时期的中学文学教学	363
第一节 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教学	363
第二节 中学文学教学改革的设想	364
参考文献	371
索引	383
后记	385

绪 言

一、研究缘起与现状

(一) 研究缘起

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刊发了批判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女儿的作业》和《文学教育的悲哀》。这三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广泛关注,不久又引发了激烈的论争,一时可谓群言竞出,莫衷一是。论争声中,否定多于建设,感性的批评又多于理性的分析,甚至有人发出了“误尽苍生是语文”的愤激之辞。其实,现代语文从独立设科不久直至今天,对其批判之声就不绝于耳,甚至用“误尽苍生”来批评语文教育在20世纪前期就已不时出现,如1920年种因对清末民初以古文为主的语文教科书提出批评时说:“以为部定既说‘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就当教学生研究‘文选’派的辞藻,‘桐城’派的古文,‘江西’派的诗,还有甚么‘说文本字’,甚么‘训诂上的典语’,也要教他们模仿使用,这才误尽苍生”^①。又如1932年权伯华在批评当时的语文教学法不当时说:“现在学校里面,学科既多,限期又短,仍用私塾方法,不要‘误尽苍生’了吗?”^②

这场发端于1997年的语文教育批判的焦点在语文教科书中的文学教材、教法及测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第一,教材选文。多数论者认为,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多为实用文章而少文学作品;在这少量的文学作品中,多为二流三流作家的作品而少一流作家的作品;在这更少的一流作家的作品中,又多为二流三流的作品而少一流的作品。第二,教学内容。因为众多教者将文学作品作为思想教化和“语文训练”的工具,而非作为涵养学生审美情趣的凭借,所以其教学内容选择,又多为揭示作品中所含的道德、思想(尤其是其中所含意识形态),以及按文章学、语言

① 种因:《对于现在中学国文教授的批评及建议》,《教育杂志》,1920年第十二卷第五号第7页。

② 权伯华:《初中国文实验教学法》,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3页。

学的做法而分析其静态的言语形式，而不是让学生体会其中的情感、趣味而获得审美享受。第三，教学过程。教学过程程式化、机械化。一般是按照时代背景的介绍、作者生平的交代（含创作经过）、段落大意的分析（含解词释句）、主题思想的归纳和写作特点的总结这样的顺序进行，这违背了文学解读应先整体后局部等规律。第四，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单一。一般以教师的讲解分析为主，很少让学生参与讨论，或让其阐发自己的观点，违背了文学解读应该以读者的体验、个性化的理解为宗旨的基本规律。第五，测试评价。试题以客观题为主，答案唯一、确定，无视文学文本所具有的充满未定与空白的基本特征，违背了读解个性化、结果多向化的规律。

在语文教育遭遇了“（20）世纪末的尴尬”之后，21世纪初的一些研究者试图以文学教育为突破口，希望通过对历史上的文学教育的研究以汲取经验、总结教训，从而寻求语文教育的救赎之道。又可能因为21世纪初的语文课程改革被认为是以西方的课程理论为基础而招致诸多不满，所以长期不太被重视、研究成果不多的文学教育史研究，尤其是民国文学教育史研究成了热点。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起因。

（二）研究现状

下面将目前有关中学文学教育历史的研究分为“外研究”和“内研究”两类，并概述其贡献与不足之处。

1. 外研究

此处的“外研究”，不仅指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更是指其研究的立场是基于现当代文学、文艺学、语言学等非语文学科。这类研究的兴起，除受《北京文学》刊发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对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进行的批评文章的触动外，还与这一时期的现当代文学、文艺学、语言学研究试图拓展其研究领域有关。文学、语言学研究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中小学语文教育上，多是试图探寻这些学科对语文学科的推动作用，考察其在语文学科中的存在形态。较早进行这类研究的有罗岗的《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以文学教育为线索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后续出现的有王林的《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张伟忠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变迁与中学语文教育》（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蔡可的《现代中学语文课程与文学教育的演变》（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李宗刚的《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

(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 2006年)、林喜杰的《群体性解读与想象——新诗教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金兑妍的《50—80年代中学语文教科书与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等。其成绩主要有两点: 第一, 开拓了语文教育研究的领域, 使人们对语文学科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课程、教学的范畴, 而转向探讨其与文学、语言学的关系; 第二, 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即学科交叉法。其不足主要有三点: 第一, 研究时段的限定。因为上述研究一般是研究语言、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互动过程, 所以虽然其多以“现代”为名, 但所论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 涉及“五四”之前相对较少, 对1937年后几乎不涉及。第二, 研究立场的确定。这些研究, 因为其立场在语文学科之外, 研究目的主要也并不在于推动语文学科的建设, 所以其切入点是文学、语言学等非语文学科, 其所论一般停留在对部分教材作提要式分析的层面, 很少真正涉及语文课程, 几乎不涉及语文教学。也因为这些人缺乏语文学科素养, 使他们难以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角度来考察分析, 所以其中有些“研究”往往是进行现象罗列而已, 有些论著写得竟然像“现代语文演义”。故从语文学科立场来看, 有人指出这些研究只是隔靴搔痒或稍及皮毛。第三, 研究思路的选择。历史研究应首先搜集大量的史料, 然后对这些史料进行梳理、比较、分析、概括, 再得出结论, 所以历史研究观点应该是非预设的, 研究成果的文本框架是生成的, 这种用归纳法所进行的研究才是真实的研究, 才是有价值的研究。然而上述研究不少是根据现代文学、语言学著作中所提到的关于现代语言学或文学发展与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一定关系而着手的, 如一般都会提到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 1929年版)中所述的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与“国语教育的需要”有关, 以及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商务印书馆, 1934年版)和钱理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3期)一文中所提到的“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改革与中小学国语教育存在互动关系等观点。这种研究采用的是演绎法, 其“研究”只不过是寻找历史资料佐证他人的观点, 或者说, 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 只不过其例证显得更充分、论证过程显得更清晰而已。

2. 内研究

和外研究相对, “内研究”指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为教育学, 更指其研究的立场是基于语文学科。这类研究和外研究相比成果显得不多, 目前只有郑国民等著的《当代语文教育论争》(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闫苹编著的《中学语文名篇的时代解读》(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范远波的《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黄耀红的《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年)、王明建的《囿于传统的突围: 语文科课程早期现代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年)等。其成绩主要有两点: 第一, 由通史转向专题史研究。与前期语文教育史研究内容包罗万象不同, 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比较集中, 如集中在教材或文学教育等某一方面。第二, 由宏观转向中观、微观研究。与前期语文教育史研究追求宏大叙事不同, 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对象上看趋向于中观和微观, 如《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专门研究了民国期间小学语文教材编制的发展, 包括选文特点、组织方式等。《当代语文教育论争》从不同时期各版本教科书中的《社戏》一课的导读文字和课后练习来展现 20 世纪 50 ~ 90 年代阅读教学的阐释方式的转变, 《中学语文名篇的时代解读》从《背影》等作品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显隐轨迹及对其所作的各种不同的解读来分析其在语文学科中的接受史。这种研究往往能以小见大, 见微知著。其不足也有两点: 第一, 就事论事。研究视野不够开阔, 不少研究只就所研究对象来分析, 而不是将其与当时的教育思想、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联系在一起, 对研究对象往往开掘不深, 所论也较浅。第二, “述”“论”失当。资料来源丰富的研究, 往往以排比呈现资料为主; 资料来源缺乏的研究, 往往以空发议论为主。例如有论著竟然能在不考察语文教材和文学教育论著的情况下, 仅根据一些课程文件、零星的历史记述(自传、日记、回忆等)和自己的玄想, 而凌空蹈虚地“建构”出近一个世纪的中小学文学教育史,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鉴于文学教育历史研究的必要, 以及目前此类研究存在的问题, 本书试图从课程与教学两个层面来梳理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 呈现其发展变化过程, 总结每个阶段文学教育的特征, 并解释其中的原因。

二、研究立场与方法

(一) 研究立场

1925 年, 阮真在《论高中文科读文教学》一文中, 对一些已在“新文学”界崭露头角后从事于语文教学的人在教学时大谈“新文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他说: “盖为教师者, 仅有文学上偏面之研究, 而无教育学理之研究, 仅以文学家之态度教学生, 而不以教育家之态度教学生故

也”^①。目前,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在从事语文教育研究时所持的往往也是“文学家态度”而无“教育家之态度”。其实,语文学科的研究者和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医生和药物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医生主要是通过对病人的望闻问切,诊断其病灶在何处,推断病因是哪种,并开出处方,对症下药,至于所用之药,则应由药物研究者来研制、提供。高明的医生当然有时也可自制一点普通的药物,对看病感兴趣的药物研究者当然也可以开一些常见的处方,但二者的分工应相对明确,不可过分越界。如果医生以为自己制的药能包治百病,药物研究者以为自己开的处方可“方到病除”,其结果要么是医死病人,要么是造成误诊。现在一些语文研究者试图研制本该属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者研制的“语文课程知识”,一些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者试图提出语文课程设置或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新主张,虽然这两种努力都值得鼓励,但同时我们对此也应有所警惕,因为过分“越界”的做法可能并不能救治语文教育的沉痾!所以,本研究从语文学科立场出发,试图通过观察清末民国文学教育的发展过程、基本形态、不同特征,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二) 研究方法

我对研究方法的喜爱胜过研究对象,所以在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并没有就某个具体的教育事件、现象、思潮和做法等询问我的导师郑国民先生,而是不停地向他请教有关研究的方法。我们师徒俩那几年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探讨集中体现在《百年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该文在“回顾”部分对百年来语文教育史研究进行了分期,并评述了每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概括了其基本呈现形态和主要特征;在“前瞻”部分提出要加强研究意识,改变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访谈相结合,述史与论史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思想层面与实践层面相结合,学科教育与整个教育及社会思潮研究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研究相结合),加快资料整理,拓展研究领域,开展史学研究等。这篇文章所探讨的主要是宏观的研究策略^②。在《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一书中,我们提出研究问题的选择、框架的形成、观点的提出、材料的选择等都应该是非预设的。换句话说,研究的过程就是成果生成的过程。书中主

① 阮真:《论高中文科读文教学》,《中华教育界》,1925年第十五卷第六期第1页。

② 郑国民、张心科:《百年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10期。

要探讨的是中观的研究思路^①。这里再具体谈一下微观的研究方法。我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提炼、立体、参证、推论”八字。

1. 与“熔铸”相对的“提炼”

古人言，治学如取铜。取铜之法有二，一是“采铜于山”，二是“熔铸旧铜”。前者十分艰难，要跋山涉水、披荆斩棘、掘地三尺、精心提炼；后者相对容易，只需稍费精力收集废铜、稍微加热熔化冷却即成。不过，前者是“提炼”所得，所得的永远是新铜；后者是“熔铸”所得，所得虽然与熔化前旧铜的成色、形状不同，且貌似新铜，但本质上依然是旧铜。研究一般的历史，自然必须亲自对一手材料进行梳理、选择、辨析、归纳，而不宜照用辗转所得的“事实材料”和盲从他人所阐发过的观点。研究学科教育历史，其中的一手材料又必须是当时的教科书、教授书、教育文件、事件实录等。一些亲历者若干年后的回忆文章，多属印象式的叙述或论说，而且其对有些问题的判断受当时其他人的论断影响，所以需要对其加以甄别；即便是那些当时论者针对其所处时代或稍前的教育所写的“论文”，其所论对象与论者所处的时代相同或接近，也因为它是经论者“提炼”所得的结果，而它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只能算是“二手材料”，所以也只能作参考之用^②。如多年搜集、审定、研究语文教科书的黎锦熙在1933年评论民国初年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时说：“民国初年（一九一二以后）中学学制无甚更张，所出国文选本，惟内容稍稍扩大：高年级略选经籍，似至此始知由姚选进而取法乎曾选之《经史百家杂钞》也者；又稍稍入诗歌。”^③然而，我们通过对1912年刘法曾和姚汉章

① 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② 在使用文献时，还有人常喜欢用“某某资料选”，在我看来也不恰当。如果我们将资料当成是蘑菇，那么寻找原始资料就像是在山林或草丛中找蘑菇，而看资料选就像看别人已经采摘、放置在一个篮子里的蘑菇，对于采摘者与观察者来说，这其实是两种不同蘑菇，在采摘者的眼里这个蘑菇是与其下的土壤、周边的环境以及其他蘑菇等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观察者的眼里，这就是一个独立的蘑菇；而且两种方式所得的收获并非均是得到了蘑菇，观察者更是会获得发现的快乐，掌握有关蘑菇的知识及搜寻的方法，等等。冯友兰在谈论治学方法时指出，“真正的思想体系不是可以拼凑而成的，不是可以‘糅为’的。流传的瞎子摸象的故事可以作为比喻。有的瞎子摸着象的鼻子，就说象是一根粗绳子。有的摸着象的腿，就说象是一根大柱子。如果有人把这两种说法拼凑起来，说象既是绳子，又是柱子，这个人实在还不胜那些瞎子。因为瞎子们毕竟和象还有点接触，而这个拼凑的人连这点接触也没有。”（《冯友兰文集（第1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上述依据当时一些人的“论文”而不是亲自查阅当时的课程表格、教科书、学生作业等行为，就是冯友兰所说的瞎子拼凑，这种研究行为叫“睁着眼睛说瞎话”。

③ 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师大月刊》，1933年第二期第4页。

评辑、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前3册课文的体裁进行统计后发现,其中诗赋课数竟约占其全部总课数的31%。这样,我们就不能直接照搬黎锦熙的说法而应对其进行修正,要在“又稍稍属入诗歌”之前加“绝大多数”四字以示限定。又如,1934年多年从事中学国文教学和研究的阮真在《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一文中称:中学国文教学在1926年后才进入“翻译文学大盛时代”^①。然而,通过对1923~1936年出版的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中的翻译文学进行统计后发现,翻译文学进入中学教科书的高潮期是1923~1926年,翻译文学一般要占到课文总数的12%~16%,甚至出现了像《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1923~1926,孙俔工、沈仲九编写,民智书局出版)这种总共6册中竟然有2册全为外国文学的情况;而翻译文学在1926年之后的中学国文教学中恰恰处于退潮期,一般只占到课文总数的2%~7%。其实,阮真所说的“翻译文学大盛”是指翻译文学在教师自编教材中的境况。当时国共两党因政治斗争而宣传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导致新潮的教师和激进的学生争相采用体现某种主义的翻译文学做国文、国语教材。再如,如果比照一下《奏定学堂章程》中所设定的“中国文学”科的课程内容就会发现,我国第一本中学国文教科书并非黎锦熙、阮真等人所说的是1908年5月林纾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读本》,而是1905年刘师培根据“中国文学”科所编写、国学保存会出版的《中国文学教科书》。所以,只能说我国第一本“文选型”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是《中学国文读本》。这样一来,黎锦熙、阮真等著名学者论著中被过去多数论者视为“定论”的说法,现在看来就有点不可信(存疑),也就只能被视为仅供参考之“一说”了。其实,如果所进行的真是“采铜于山”式的研究,那么我们会发现后世论者所加在王森然编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和夏丏尊、叶圣陶编写的《国文百八课》等之上的美誉应被重新估量,因为前者几乎是在“辞必他出”式地辑录他人著作,后者则是较高级地“师其意”式地集成了他人的做法。关于提炼之法,我们将在以下“参证”法的申说中作进一步的补充。

2. 与“平面”相对的“立体”

对于一个研究对象,当然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观察,但所得的印象只是其“一面”,如果研究时再就某一点来立论,那所呈现的当然只是“一面之词”。历史是多面的,从一面观察所得结论是片面的,从一点切入往往会使历史变形。所以,研究历史的视点应该是多面的,视角应该是多向

① 阮真:《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二十二卷第一期第9页。

的。就文学教育来说,随着教育宗旨、学生观、文学功能观的变化,其在课程(课程思想、文件、教材)和教学(教学内容、过程、方法)等方面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要分析文学教育不能仅从一个角度来观察,从某一点来立论。就教材来说,单从某一方面分析其中的文学也是不恰当的,所以,本书在分析教科书中的文学作品时,往往从选文功能和标准、实用文章和文学作品的比例、文言作品和白话作品的比例以及作品呈现方式等多个方面来考察。又如某一文学作品可能出现在不同时期的多种教科书中,但不同编者对其在课程和教学设计和实施的方面的考量并不相同,所以,本书将以《项脊轩志》和《最后一课》为样本,分析其在各个时期的接受史,希望读者能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教育及其发展获得更为具体的感受。

3. 与“孤证”相对的“参证”

现在许多研究者往往仅凭某一时期的某一套教材,或某篇文章介绍的教法,或依据某一学者的观点,就对某一时期的某一教育现象下结论,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教育是复杂的。就教材来说,同一时期的教材往往很多,就某一套教材来立论,无疑会以偏概全,例如传统蒙学教材到20世纪40年代还在我国某些地区作为教材使用,1947年梁瓯第在考察新疆教育时竟然发现当地还在“重温启蒙古本”,他在《新疆的教科书问题》中说:“在马纳斯河畔,小学生们读着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的东西,年长的学生便念幼学琼林。当你听见‘天地玄黄’‘人之初’的呐喊声在房舍里播送出来的时候,你简直不能想像这是在塞外的西域地方,那些小孩子装腔作势在摹写着红格的‘上大人,孔乙己’,你更不能不钦佩旧教育流传之广,势力之固了。”^①就教法来说,中国地域广大,区域之间的教育也不平衡,所以你很难说,某一时期就存在某一种教法。就某一教育家的观点来说,因为其受个人视野、水平的限制,往往并不能全面深刻地概括当时教育的某些特征或公允地评价某些教育现象。例如,假如现在让我们来评价当下教材中文学作品的比重、题材、主旨等,往往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因为现在出版的教材很多,能搜集到两三套完整的语文教材就已属不易了,更不要说作出全面地判断了。数十年后,某一图书馆将现在出版全部的教材收齐,如果某一研究者再来研究,那么其所得的结论往往就比今人费力搜集的两三套甚至是十几套教材研究后所得的结论反而要全

① 梁瓯第:《新疆的教科书问题》,《教育通讯》,1947年第三卷第九期第27页。

面、客观得多^①。就研究来说，有些学者也常常只是为了迎合读者阅读的心理而故发偏激之辞，一些学者撰写有关语文教育的论文时，往往从批评当时的语文教育开始，如1927年一篇文章的首句便是“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国文教学的重要，但同时也没有一个人不承认现在国文教学的不满意”^②，这些论者在批评时又多就某一孤立现象立论，如“挽救国文”的口号在1913年就出现了，论者作此呼吁的依据是“有中小毕业生，执笔作书，格格而不能通者矣”^③。又如常听说某一学校的学生上课看课外书，就说学生们都不喜欢国语（文）了，1917年有人称：中小毕业生喜欢横行的英文而不喜欢竖排的国文，“班下自修，孜孜竟日，尽横行字。读国文者十无一焉。即就班上言之。讲西学则群侧耳以听，握管以记，竟竟然惟恐其一字一语之或遗也。及讲国文则教者谆谆，听者藐藐，谈笑者有之，戏谑者有之，读他书而阅小说者，亦无不有之，其隐几而卧者，犹不失为好学生也。”^④或者发现某一年某些学生的升学试卷中的作文成绩不高，就说学生们的作文水平普遍下降了，如1943年有人就因在批阅1942年度的部分高考国文试卷时发现中学生的作文水平不高，而又发出“抢救国文”的呼吁^⑤。1948年，有人甚至说：“十几年来中学国文教学，一点没有效果。”^⑥从以上引文中也可以看出，这些人在分析问题时常陷入以为“破”得越彻底就会“立”得越牢固的思维怪圈之中。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当时的一些中小学各学科学习兴趣调查结果以及亲历者的回忆来看，20世纪前期多数学生最喜欢的科目是国文（国语）。教师在上课时中学生在偷看小说，这其实只是个别学生才有的行为，而且这种情况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并不能以此来证明国文教学水平普遍偏低，也不能说明学生普遍厌恶学习国文。如1933年在江苏、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高二学生最喜欢的学科前三位是国文（73%）、英文（58%）和化学（52%），高一学生最喜欢的学科前三位是几何（79%）、国

① 研究历史应与研究对象存在的时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不仅仅是由时间距离产生心理距离而便于对历史作全面地把握、客观地评价，更因为资料搜集的相对齐全也需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

② 张文昌：《中学国文教学底几个根本问题和实际问题》，《新教育评论》，1927年第三卷第八期第4页。

③ 汪懋祖：《论挽救国文》，《独立周报》，1913年第二卷第十期第1页。

④ 陈裕祺：《今日之学生与国文》，《清华周刊》，1917年第一百零四期第1页。

⑤ 罗根泽：《抢救国文》，《国文杂志》，1943年第二卷第一期。陈卓如：《从“抢救国文”说到国文教学》，《国文杂志》，1943年第二卷第三期。钟顺光：《关于“抢救国文”》，《国文杂志》，1943年第二卷第五期。

⑥ 孙毓莘：《论中学国文教学》，《国文月刊》，1948年第六十四期第1页。

文(77%)和化学(74%),选择国文在初三虽然退居第四(49%),但在初一又升至第一(80%)^①。又如1935年钟鲁斋在福建的一些中学和中等师范进行了一项调查,关于“在校内学生觉得最有趣的科目”的调查显示“国文”位列第一,在434人中最喜欢语文的有75人(男61人,女14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17.3%。其他学科依次为英文、物理、化学、历史、代数、几何、音乐和地理等^②。1947年,高时良、徐君梅和林性彝在福建省调查中学生各科成绩时通过数据统计发现:“国文、外国语、数学三主要科中,高中方面以国文成绩较佳,外国语次之,数学较差……初中方面,亦系国文成绩较佳,外国语则稍逊于数学。”^③小学儿童最喜欢的科目也是国文、国语。1926年,俞子夷在江浙各县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儿童最喜欢的课程是国文,喜欢国文的占儿童总数的29.4%,其他依次为英文、算术、图画、手工、体操、理科、缀法、地理、写字、历史、唱歌、珠算、文艺和修身^④。1934年2月,通州师范一、二年级学生和附近小学教师合作调查儿童兴趣结果又与之相反,发现“儿童最喜欢的功课是国语,共有四六五人,占百分之三四·一;其次是算术,占百分之一五·七;再次是劳作、音乐,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若以性别区分,则对于国语、算术的兴趣,男生超过女生……其中,男生喜欢国语,女生喜欢音乐,尤为显著。”^⑤但是,也有例外,1931年上海市立第一实验小学的教员郁树敏通过问卷调查,按喜欢的人数的多少先后排列出的科目是算数(46人)、唱歌(44人)、艺术(39人)、常识(18人)、体育(15人)、国语(14人)、英文(3人),可见国语列倒数第二^⑥。不过,这可能与调查的人数过少且集中在一个学校有关。如钟鲁斋在《中学男女学生心理倾向差异的调查与研究》中提及此前兴趣调查时指出其“美中不足”数处,并以郁氏的调查为例来说明,其中第一条就是“限于一间学校。……郁氏的调查限于上海市立第一实小,一校的儿童因环境关系或与他校的儿童心理,不尽相同。”而且,“调查的人数微嫌太少:如俞氏调查

① 陈选善、郑文汉:《中学生学科兴趣调查报告》,《教育与职业》,1933年第一百四十九期第685~691页。

② 钟鲁斋:《中学学生的特征与中学教学法》,《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二十三卷第八期第34页。

③ 高时良、徐君梅、林性彝:《中学生学科成绩之调查研究》,《中华教育界》,1948年复刊第二卷第十一期第43页。

④ 俞子夷:《儿童对于各科好恶的调查》,《教育杂志》,1926年第十八卷第六号第1~8页。

⑤ 罗子欣、王之璐:《小学儿童兴趣的调查研究》,《教育杂志》,1936年第二十六卷第八号第79页。

⑥ 郁树敏:《小学儿童兴趣之调查与研究》,《教育杂志》,1931年第二十三卷第七号第43页。